

反思与对谈

朱青生 庄泽伟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反思与对谈

朱青生 庄泽伟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思与对谈/朱青生, 庄泽伟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130-4323-6

I. ①反… II. ①朱… ②庄… III. ①人文科学—研究
②哲学—研究 IV. ①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864 号

责任编辑: 高超

责任校对: 董志英

装帧设计: 唐人佳悦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反思与对谈

朱青生 庄泽伟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83 责编邮箱: morninghere@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

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130-4323-6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学科反思在技术上是对一个学科的学术性整理，了解其起始、结构、重要问题和最近的进展。同时，作为一个有着伟大的文化传统而又面临巨大的精神冲突的国度，中国的学科反思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中国学界和大学所设的学科距离整个国际学界和大学同类学科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世界现代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学科，它们由先行现代化的国家所创设，后被中国引进。目前国内与国际最高水平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一定是在非常具体的方法、知识、条件和观念的差别中形成的，所以，我们在执行推进北京大学本科改革的“元培计划”实验的过程中，一直将对于这种具体的差别的探讨和检查作为导师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元培计划”的导师是北京大学最熟悉所在学科情况的人，而且与校内外、国内外的同行联系密切，所以同他们以及同由他们介绍、推荐的专家逐个会谈，

就将留下一部这样的文件《反思与对谈》，它将反映中国学界和学院的某一个学科（特别是文科）的历史、现状和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以及对学科进行弥补和推进的设计。设计的依据是纯粹的学术成果。学术的思想最终凝结为著述，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怎样使之尽快而周全地让国内学界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学科主要著述目录。现代文献目录学正由专家们提纲挈领、逐层别类地列出。既然各个学科中许多重要著作不是用中文写就，那么，哪些部分有必要译成汉语，哪些亟待翻译，都在这个文件中作了揭示。我们与一般的学科反思工作方针的差异，是侧重于在学科反思的动态判断中，展现对学科起关键作用的概念；而对学科专门问题的深入讨论，则是各学科自我反省或探索的任务。我们在反思中实际上看得到学科各自的发展概况，以及学术界、文化界对其关注的角度和广泛探讨的问题。

这次项目起始于重庆出版社卢军的一个策划，就是请一个主持人与各文科学者对谈，以概述中国文科的学术现状。卢军是艺术学院出身，大概是深感于艺术和艺术史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科而言，其研究涉及的学术范围最广泛，接触的相关知识最为驳杂，于是就决定请一位艺术史家来主持对谈。当时我从欧洲负笈归来不久，又在北京大学与众学科的同事相处，就收到了她的聘请。起先我不敢担当，因为这种工作要花很多功夫，况且，花多大的功夫

也还不一定能胜任。后来有两个意愿正好与之相合，所以就勉为其难进行尝试了。其一是当时我有一个学术计划，即读一些圣贤之书，通天地心，正想找一些好学者请教。其二是我承担学校的本科战略小组的工作，后来因为担任“元培计划”导师委员会主任（2001年8月—2005年2月），再加上周围有一批优秀的学生追随读书，对谈的准备依次开始。

工作顺序是这样的：在学科上从哲学开始，然后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或者历史学、文学（学）、语言学、神学、艺术史、音乐学。工作程序如此：先联系一个学科的访谈对象，获得同意后，把他的著作全部收集起来阅读，确定访谈的主题；在访谈学者的研究生和助手的引导下，将此学科中与谈论主题内容相关的主要著作加以收集，在访谈对象的建议下，精读其中的一二种，泛读数种；然后进行谈话、录音、整理，初试是在1999年访谈周国平教授，在海德堡的纳卡河边，一杯红酒，满眼青山。最近一次是初约于2006年，2015年才得到实现的苏力访谈，因为起意与前几次对谈同时，就归并在一起了。

如今得庄泽伟先生愿心，在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下重启“人文科学反思专项”，把已经做的部分发表，今后陆续再做。《反思与对谈》总与读书相伴，所以也不求完整，行则行，止则止。发表出

来多少有益于学界、有益于大学，我们也就因势为之。本来每个访谈都有一个书目整理工作相伴随，尤其是对本专题著作汉译的现状和问题的小结，作为附录，但是由于此书延后了十年出版，书目意义不大，所以割舍了。但是当年如果没有对书目的收集和浏览，又不可能形成对谈，在此，谨向当年一起参加工作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表示感谢和敬意。

朱青生

目 录

刍议中国人文科学反思（朱青生）	1
作为人文科学的哲学——周国平访谈录	14
作为西学根基的古希腊哲学——靳希平教授访谈录	32
作为西学源流的基督教哲学——赵敦华教授访谈录	72
科学作为一种哲学——吴国盛访谈录	93
哲学与汉语思维——陈嘉映访谈录	119
关于政治的思想——李强访谈录	147
法理学的情况和问题——朱苏力访谈录	164
后记：我的人文主义观（庄泽伟）	199

刍议中国人文科学反思

朱青生

反思学科是一种思想。

学科反思从观念上涉及了对学科本身的性质和意义的批判和质疑。学科是历史形成的，已经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当然如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建构，一些新的问题将构建新的学科。旧有的学科之名下，内涵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学科与学科之间正在交融、替代或互不相容，学科交叉已经日益频繁，但学科的某种不可取代和模糊的性质也日益被深刻地确认。

在以思想为对象的哲学领域，一方面，因为经典问题被搁置，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语言哲学发展成为两个重大的学域；另一方面，每个学科对自身的反思到达了超越技术层面的境界，即成为哲学。因此，学科反思成为这样的一种观念活动：借助于

对一个现存的学科的思考，由专门知识到知识本身，再到构成知识的人的本性，从而成为一条精神道路；同时又重新审视精神的需要，检视它是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被人的知识或学科割裂或遮蔽。反思学科因此而成为一种思想。

不同的国度对“人文”的理解不同，在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传统中，“人文”有不同的结构、比例和配置，也就是说，它在精神的领域中所占的位置和起作用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不同国度对人文科学的反思是不同的。

在同一种文化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人文科学进行反省的问题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近代中国，实际上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人文”。一个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从西方翻译进来的“人文科学”（Humanities）；另一个是中国固有的“人文”（renwen，大约相当于 Liberal Arts，其实这个词并不能完整准确地传达中国“人文”的意思），其中还有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汉代之前中国的人文，第二个分支是汉代之后与印度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一种人文。

1840 年，英国人把毒品（鸦片）销售到中国市场，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抗，英国用武力击败了中国军队，流放了主持禁毒的大臣林则徐，迫使中国开放了毒品和工业产品市场，获取了非法暴利。中国在与西方的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的知识界

意识到中国的文化需要进行改造，这样就把中国固有的人文放在了一个被批判的地位，最终抛弃和遮蔽了自己的两个固有的人文传统，而全面接受了西方的人文科学。正因为此，便有了今天的北京大学，便有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便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实际上指的是西方的人文科学。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的提高，1840年以后的那个“失败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1997年香港的收回意味着对英国用武力贩卖毒品的历史的清算，因为这次收回具有极大的象征性，它不是通过战争，而就是很简单地对罪犯权力的剥夺——直接收回。这种政治背景必然伴随着对人文的反思，这个反思就不是简单地对西方的人文科学的反思，而是同时对中国固有的人文进行反思。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对引入西方、改造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四运动”进行了反思，其主要的思想成绩就是总体上出现了对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忽视中国文化的激进思潮所带来的损失进行的反省。当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对复古的重视和向传统的回归，但这与今天的反现代化的保守主义以及反西方的、崇尚封建王权和专制民族主义的思潮完全不同，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尚处于改

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环境中，无论是继续强调向西方看齐，还是对固有文化特点、本质和可发展因素进行重新评价、激活，都是指向现代化，强调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两种“改革思想”的交锋，是关于两条现代化道路的争论，而不是关于是否需要现代化的争论。

一种“改革思想”是一个以电视片《河殇》为代表的思潮，认为中国只有继续放弃自己的传统（被象征性地描述为“黄色的土地文明”），转向西方的文明（被象征性地概括为“蓝色的海洋文明”），才能完成文化的改造和现代化的发展。另一种“改革思想”是一个以纪录片《天安门》为代表的思潮，但由于这部片子最后没能编完和播出，也没有一个代表性的文本出现。直到2007年我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这部纪录片（我作为总撰稿）时，才把这种思想公开表达出来。其象征是紫禁城，天安门就是紫禁城的大门、正门，虽然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象征、标志物。在这部片子里，我们强调的是，没有一个国家和文化可以借用其他的文化来改造自己，只有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可发展因素，并激活它，让它成为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的力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这样的思想其实根植于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另一种反省，这就是对于整个中国针对西方的态度的反省，对于中国接受西方人文

科学和启蒙精神的反省。从政治或者民族情绪的角度来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所处的状态很像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费希特那个时代的德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对人类创新的实验、对大革命、对人类的自由平等理性的精神、对民主的制度充满向往；另一方面，在政治、社会、学术上又处在被革命者、被率先经历人文自觉和启蒙的先进者压迫、剥削和羞辱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他们不可能不纠结，因为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榜样”，而他们的榜样在把美好的、未来的东西带过来的时候，同时也带来了对本国和本文化传统的根本否定和贬低，所以需要追索更为普遍的人性，作为自我民族（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如果你读过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告德意志同胞书》），就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怎样来做人文科学反思？这个问题好像回到了费希特，其实我们具有双重任务：第一，要对人文科学到底是什么的本质问题，即人是什么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第二，要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和人文科学（Humanities）及其对现今的影响进行研究和思考。也许在中国，人文科学反思这个项目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再分作四点进行思考。

第一个方面，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对当今我们所共同遭遇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所有问题

进行追问和思考，找到解决的方案和理解的出路。我们处在一个图像时代，处在一个知识和理性受到怀疑的“后福柯时代”，处在一个科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基础、科学和全球化如此“统一”的时代。然而，不同文化对人的理解的差异性竟然可以导致“9·11”“查理事件”以及IS国家成立这种恶性事件。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样的冲突非但没有解决的可能性，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全人类在根本和根源问题上，对于“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的理解是否能够沟通，又到了需要重新深入思考的时刻。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对历史上的人文学科和人文科学进行反思。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实际上是在三个方向上进行了反思：

第一个方向是，中国古代的“人文”指的是什么？其构成结构、配置是什么？

第二个方向是，中国通过佛学接受了印度文化之后，“人文”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三个方向是，中国所接受的西方人文科学是如何引进的？

第一个方向要反思的是，在中国的上古，确切地说是尚未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时代（一般划到汉代结束，即公元220年之前），“人文”指的是什么？其构成结构、配置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最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关于基本理法，即中国曾经

的一个有别于希腊和希伯来的“思维方法”的讨论。这个问题是通过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贡献被带进西方哲学问题的讨论的。他发表过一部论著 *De l' Etre au Vivre. Lexique euro-chinois de la pensée*，其中已经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他将其归结为“因果”（Causalité）和“势”（Propension）的区别问题。一个法国的汉学家能够将中国的文化理解到如此深入的程度，令人敬佩，因为他是从西方的因果逻辑思维 and 中国的审时度势的变化思维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了这个关于“势”的理解。其实再深入一步，也许就接触到了中国的“人文”的精神根本，也就是中国“人文”这个词的起源^①。《易经》中的根本“理法”比对《易经》的引申的解释更为重要，因为它不是“逻各斯”，而是“易”。“逻各斯”因为具有语言和导向正当思维这双重意义，而成为逻辑学的基础，也是科学的根据，而“易”呈现为象，其根本是图像，是对事物本质的直接显现，无法转变成语言，也没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所以在《易经》中，任何因素都可能是正当的，也可能是错误

① “人文”出于《易经》“贲”卦的象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朱熹把“人文”和文明的关系“文明以止”解释成“各得其分”，这就是结构和配置的关系。人文

的；可能是存在的，也可能是虚无的；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破坏的。关键在于，它要在“变易”中成立，而“变易”是不断地变化，永无休止的，这就是“易”的本质^②。这种变化既没有存在的物质，也没有所显现的一定的规律，自由只不过是各种变化的意志被不断地综合调节、破坏和再度被综合，而人的正当愿望就是使得各种意志之间的调节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因为人为的介入（这种介入不是出于个人自私的目的和欲望），变化中的和谐和均衡再度实现，而这个实现的瞬间又成为新的变化的开始。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既不可能有固定的上帝，也不提倡不变的政

（接上注）

是人所遭遇的问题恰如其分地分置在可以被观察和理解的结构中，这个结构在《易经》中被称为“卦象”，卦象有其“德”。朱熹云“又以卦德言之”，这个“德”就是世界的本质所具有的道德规律。这个道德并不是伦理的道德，而是伦理的根源，也就是它的合法性，也就是自然所具有的合理性。“人文”从中国古代的《易经》到宋代，一直都是被人们这样理解的。它不过是一种对自然法则（天文和地文）的模仿，并在人类社会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和运行规律，这就是所谓的“人文”。

② 中国古代称“易有三易”，近代学者钱钟书也将“变易”“不易”“简易”并列陈述，其实这是个肤浅的理论。“简易”只是为了运思的需要而做的工具化处理，所以在传说中的文王（文王是孔子所尊崇的圣人）之前，

治理想和意识形态。在变化中不停地用自我的牺牲和奉献来获取平衡的过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太平”（而不是“自由”）是中国人文的最高准则。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与从康德到费希特的德国哲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第二个方向要反思的是，中国通过佛学接受了印度文化之后，具有了“2+1”的新的人文，1是古代自身，2是印度传入，二者结合，产生了以玄学和禅宗为代表的新的思辨方法，并且取得了王阳明这样的“心学”成果。而“心”和“物”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这个问题在中国长期以来是从“经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结合并发展的成果。其中最为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把理念（心）作为连接世界及指导行为的统一方式，源出于将理念作为生成世界的

（接上注）

人们是用两种小棍子，即“筹”，来进行所有复杂问题的处理，称为“运筹”。而“不易”只是指对这种性质的尊崇和肯定，即变易这个道理是肯定的、不可变更的。这三者根本不是同一性质的归纳。中国受到随佛教传入的印度原始思维的影响，很容易把一些不等价的语言逻辑经过两两相从，将二者相作用的结果变为第三种，再把三种并列起来说成三项。这个问题在维特根斯坦之后，已经被彻底地厘清。